

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意义

□ 肖诗桢

202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下简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作为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一是在法理层面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序言》阐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与宪法《序言》中“中国人民”概念相互照应,突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的思想精神内核,进一步强调了党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全面领导。二是通过中国话语的概念表述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体系构建,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表述中,进一步展现出中国各族人民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内生驱动力和历史主动性,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贯穿于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过程。该叙事厘清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逻辑,正确把握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间的关系,以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的喻理,强调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三是生动体现出国家发展中坚持“两个结合”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在长期建设发展进程中不断推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具体阐释了“十二个必须”的核心要义,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了由实践探索到理论深化再到法律保障的深刻变化。

深刻把握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前进方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序言》以历史逻辑为线索,从中国各族人民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概括中华

民族形成发展的总趋势,用“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从血脉、信念、文化、经济和情感上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逻辑理路。用立法形式确认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承接了我国数千年“大一统”历史传统,系统总结了党百余年来民族工作的宝贵经验,借鉴了国内外民族事务治理的经验,把民族事务治理的历史实践经验上升为现代国家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序言》以辉煌灿烂、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明史到救亡图存、共御外侮的近代英勇斗争史再到砥砺前行、改革创新的时代团结奋斗史,系统挖掘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内涵,以各民族共同记忆和文化传播发展为纽带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和一体性。明确了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指出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从历史维度上将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从文化影响和政策引导推向新的法治保障,在民族法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有利于引导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树立正确历史观,不断强化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夯实和巩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根基,有利于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各民族共同历史记忆,为中华民族发展史增添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

以法律保障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正式施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了更为坚实的制度保障。该法律从精神建设层面要求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推广,进而坚定“五个认同”。通过法律形式规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教育领域的工作任务,推动形成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体系相结合的立体结构,突破了传统学校教育的界限,有利于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常态化。从立法的高度进一步将“五史”融入推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国话语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体系全过程。在法律条款中清晰划定各级各类主体与全体社会成员在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的权利与义务,有利于鼓励、支持和引导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持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同时,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现实基础夯实、制度刚性约束、精神价值升华”三维转化机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宏观政治理念转化为全社会普遍遵循的法治共识,把“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转

化为法律条文,同时,通过教育浸润、文化交融、民生保障及法律责任等具体路径,构建起客观社会存在与主流价值认同间的制度桥梁,实现从“柔性倡导”向“刚性规约”的实践转化,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发展成果。

以“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引领各族群众增强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法理依据和制度遵循,立足新时代人口流动与发展变迁的现实基础,将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美好生活需要转化为法律体现的社会治理目标方向。在社会运行层面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始终把有利于强化中华民族的共同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首要考量,在法条设计上体现出方向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为促进和推动各民族深度交融共创辉煌提供秩序框架,有利于防范和化解民族领域各类风险隐患,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处理民族事务,进一步将制度优势转化成为推进民族事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效能,有利于凝聚民心、改善民生,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正式施行,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健全对口帮扶协作机制,加强基础设施、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推动移风易俗,缩小发展差距等方面提供了有效支持,为推动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公共服务资源合理配置,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利于将民族地区发展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中,进一步提高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各族群众共享现代化成果,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正式施行,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得以上升成为国家意志,贯彻实施好这部法律,有助于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以法治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社会发展逻辑的有机统一,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法治保障。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本文系贵州省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高校教师“三阶段三维三融合”培训模式探索与实践》(编号:GZJG2025094)阶段性研究成果。】

地方应用型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

——基于毕节市威宁自治县特色农业发展的实践分析

□ 陈雪 王松

机制,使传统农业在数智绿色技术赋能下实现提质升级。

深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这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要把教师科研、学生实践、专业建设和地方产业需求贯通起来,把课堂能力转化为县域产业创新能力。以威宁自治县大黄梨产业为例,现有销售渠道主要依靠当地政府、企业团建等团购,团购虽然能够带来相对稳定的订单,但如果产品形态单一、消费场景有限,产业增值空间就会受限。对此,需要食品加工、市场营销、包装设计、电子商务、文旅策划等力量共同介入。高校可以围绕梨膏、果汁、果干、礼盒、研学体验和团建产品等方向开展小规模试验,帮助企业做好消费调研、配方优化、包装改造、成本测算和渠道测试等工作,让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在真实场景中得到支撑。

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价值在于能够把跨学科知识转化为可执行的技能组合。如:教师负责把产业问题转化为教学项目、科研课题和服务清单,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完成数据采集、内容传播、产品展示、客户反馈和运营分析,企业和农户则提供生产现场和市场检验服务,让人才培养、科技服务和产业升级在县域形成相互促进的闭环。

推动数据算法进入乡村生产环节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重点在于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全方位推进数智技术赋能,营造健康有序的发展生态。对乡村产业而言,数智化是让数据真正服务生产决策、质量控制、市场匹配和风险防范。

调研发现,部分果园在经营过程中,人工费用、包装费用、物流费用和水果处理压力较大,线上销售更多依靠个人经验,尚未形成稳定的数据化运营。对此,高校可以帮助果园经营主体建立电子生产档案、客户档案、销售台账和成本清单,逐步形成可分析、可比较、可复盘的数据资产;围绕水源灌溉、采摘用工、冷链运输、售后反馈等关键环节,设计简便流程和预警表单;围绕质量安全和品牌信任,完善可追溯信息、标准化包装和线上展示内容,让数据可获得、可理解、可使用。

推进贵州好产品嵌入消费新场景

对贵州生态水果而言,市场空间在于能否把优质产品嵌入更广阔、更稳定、更高品质的消费场景。当前一些农户和企业已经通过团购、采摘、短视频等渠道打开市场,但从“卖得出去”到“卖得更好”,还需

要注重产品、服务和品牌的共同提升。

在产品端,要围绕不同消费需求设计多层次供给。鲜果可突出生态、口感、产地和分级标准,次果可通过加工减少损耗,团购产品可开发适合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会采购、企业团建、乡村研学等组合方案。

在市场端,要把本地优势放到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去检验。产品质量要有标准,包装标识要有辨识度,线上信息要真实稳定,售后服务要形成规则,物流成本要逐步降低。高校可以帮助经营主体梳理目标客户、设计传播内容、建立复购机制,推动“果园故事”转化为品牌信任,“产地资源”转化为消费选择,“短期订单”转化为长期市场。

完善“校地企农”协同发展机制

提升特色水果产业质量效益,地方政府应围绕基础设施、公共品牌、质量标准、冷链物流、农村公路、数字服务和消费场景开放提供支撑;高校应围绕技能培训、技术咨询、产品研发、营销服务和人才培养持续发力;企业和合作社应发挥组织、加工和市场连接功能;农户则应成为技术应用和利益分享的主体。

通过“教师指导、学生参与、企业示范、农户应用”的方式,培育一批懂生产、懂市场、懂数字工具的乡村产业骨干。面向村干部和合作社负责人,重点培训产业规划、项目运营、数据管理和公共品牌维护;面向返乡青年和“新农人”,重点培训短视频营销、直播电商、产品设计和客户运营;面向普通果农,重点培训绿色生产、采后处理、标准包装和基础数字工具应用技能等。同时,要以高质量发展成效检验高校赋能实效。评价标准不能只看调研次数和活动照片等,更要看果园管理是否更加规范,农资和用工成本是否更加可控,次果损耗是否下降,新产品是否形成订单,客户复购是否增加,农户和企业是否获得稳定收益。只有把评价置于产业链关键环节,才能推动高校社会服务从“做过”走向“做成”,从短期活动走向长期机制保障。

对威宁自治县特色农业发展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解决水源、用工、加工、物流、品牌和市场等短板的重要抓手;发展数字经济是贯通生产、服务、消费和治理的系统方法。应用型本科高校要坚持人民至上和高质量发展导向,把专业建设融入地方需要,把技能供给嵌入产业链条,把青年学生培养在乡村一线,让更多贵州好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惠及群众,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贡献高校力量。

【作者单位:贵阳人文科技学院;本文系2023年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数字经济背景下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3GZQN68)阶段性成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于6月26日上映后,票房与口碑实现双线飘红,且热度持续攀升。该影片将“四渡赤水”这一军事史上的奇迹搬上银幕,不仅再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岁月,更深刻回答了如何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这一时代命题,其以艺术化的方式证明:“四渡赤水”的胜利,不仅是军事指挥与革命信仰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空前觉醒和团结的胜利;其所承载的伟大建党精神,已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不竭源泉。

伟大建党精神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也是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精神脊梁。电影《四渡》以写实手法,呈现红军湘江血战后的濒危处境——8.6万余人的队伍锐减至3万多人,外有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内有错误路线干扰,革命火种危在旦夕。正是在这紧要关头,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实现全党全军意志统一。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革命队伍内部的集中体现。

影片着力刻画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巨大压力下的焦灼、思索与决断。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军事生死线,更是民族存续的严峻考验。“四渡赤水”的每一次渡河,都是对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精神的践行,而这种精神恰恰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敢于斗争的民族品格的集中映照。影片中基层指战员和普通战士的面孔——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却怀抱共同理想,甘愿为这片土地和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这种跨越地域的生死与共,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动人的底色。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在影片中得到视觉化的极致表达。在激战中不断倒下的年轻身影,到渡口浮桥上冒死前行的钢铁洪流,每一个牺牲都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他们用热血浇灌共同信仰,用行动昭示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内在力量。

军民鱼水情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在多民族聚居区,山高谷深、民族众多、民情复杂。红军之所以能在这些地域中灵活穿梭、屡屡化险为夷,根本在于赢得了各族群众的衷心拥护。电影《四渡》以大量生动桥段展现军民鱼水深情,这些情节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鲜活的历史教材。

影片重点刻画了红军在二郎滩开仓分盐、为贫苦群众解决生计的细节。食盐在当时是稀缺物资,红军自身供应极度紧张,却毅然将缴获的盐巴分给百姓。这一举动昭示了这支军队与以往任何军队的本质不同:他们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是真正属于各族群众的子弟兵。群众则投桃报李,土城百姓捐出木板搭建浮桥,各族青年踊跃参军,妇女为伤员熬药送饭,老人为红军带路传信。影片将这种双向奔赴的信任与支持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在共患难、同生死的实践中自然生长的精神纽带。

事实上,红军长征途经贵州期间,留下了诸多民族团结佳话,著名的“毛主席送毛衣”与“彝染结盟”即发生于此。当时,红军途经多民族聚居区,指战员们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当地风俗,主动学习方言以宣传党的主张,并严明纪律,严禁扰民和侵害群众利益。各族群众正是从红军的实际行动中,认识到这支军队代表全体劳苦大众的利益,因而愿意同心同德、共赴国难。

电影通过军民同心的感人叙事,揭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其不是外力强加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通过维护共同利益、追求共同解放而自然生成的。“四渡赤水”的奇迹,本质上是亿万中华儿女众志成城、生死相依的奇迹。当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围堵时,各族群众用血肉之躯筑起流动的“补给线”和“情报网”,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种“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逻辑,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坚实的群众根基。

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艺术实践

电影《四渡》不仅是一部战争史诗,更是一部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的影像志。在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方面,影片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其没有采取居高临下的说教姿态,而是通过个体命运与集体历史的交织,让观众在情感共振中完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归属。

影片采用多重视角叙事,既展现高层指挥者的运筹帷幄,也聚焦基层官兵和普通群众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对话、抉择、牺牲与成长,既是个体生命的轨迹,也是整个中华民族集体命运的缩影。这种“小切口、大主题”的叙事策略,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不再悬浮于宏大叙事之上,而是变得可触可感,入脑入心。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影片真实还原历史现场的艰难与复杂,没有回避内部争论、挫败与调整。恰恰是这种真实,让观众看到中华民族在逆境中的韧性。“四渡赤水”之所以成为“得意之笔”,不是因为一帆风顺,而是一次次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在绝境中寻找生机。这种百折不挠、善于反思的民族品格,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影片通过艺术再现这一过程,完成了对集体记忆的重构与强化,使年轻一代在观影中潜移默化地接续历史的火种。

共同的记忆催生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情感筑牢共同的认同。影片对红色遗址的实景拍摄、对历史质感的执着追求,本身就是一种庄重的记忆仪式。当观众在银幕上看到湿冷山谷中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身影,那种穿越时空的共情油然而生。这正是电影作为大众艺术在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方面的独特优势——其让历史不再是书本上干枯的文字,而成为有温度、有力量

的生命体验。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电影《四渡》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重温光辉岁月,更在于引导我们思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唯有全体中华儿女像当年各族群众支援红军那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突破发展道路上的“封锁线”,跨越前进征途中的“赤水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绝非理论要求,而是应对现实挑战、把握历史主动的必然选择。

(作者系民族团杂志社副编)

从电影《四渡》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时代启示

□ 金向德